学术专论

清代“汉宋之争”的“潜流”

——以科举“兼用古注疏”为中心

杨青华

［摘要］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博学有识之士，对明代以宋元经注为主的科举展开省思，倡导“古注疏”之学以矫其弊，是为清代“汉宋之争”的前奏。康雍乾三朝相继编刊的御纂、钦定诸经，在成为士子课业和应试的教材之后，其“折衷汉宋”的宗旨解放了思想，使学者士子逐渐突破宋元经注的牢笼，将目光转向以“古注疏”为代表的经史之学。其后乾嘉考据学者对当时科举中的宋元经注进行批判，提倡汉唐“古注疏”之学，并且纪昀、洪亮吉、孙星衍等试图变革科举，改用“古注疏”，以进一步加强经史考据学的地位，也因此导致了清学史上愈演愈烈的“汉宋之争”。

［关键词］ 科举　古注疏　宋元经注　乾嘉学术　汉宋之争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4－0061－016

“汉宋之争”是清学史上的一大关节，既关乎整个清学史的演变发展历程，也涉及清末民初学人对清学史的建构与书写。对于清学史上的“汉宋之争”问题，如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朱维铮、陈祖武、漆永祥、张循、於梅舫等人的清学史论著对其皆着墨甚多，而关于其缘起，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嘉道年间江藩与方东树之争，或认为发端于《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① 考其实，相比于《总目》及江、方二人的汉学、宋学的显性论争，自清初至乾嘉，清学史上存在一股关涉“汉宋之争”的“潜流”，即学界关于科举考试中宋元经注“兼用古注疏”或改用“古注疏”的论争，是为一条隐性的线索。本文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希冀由此概见清代前中期“汉宋之争”演进的内外理路。②

［收稿日期］ 2024－03－11
［作者简介］ 杨青华（1989—　），男，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合肥 230039，995510586@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江永全书》整理与研究”（21&ZD052）阶段性成果。

① 夏长朴：《四库全书总目发微序》，《四库全书总目发微》，中华书局，2020 年，第 1－2 页；张循：《清代“汉宋之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兰州学刊》2016 年第 9 期。

②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四章“顾亭林”中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思想时，对清代乾嘉汉学与科举八股之关系略有论及。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152－153 页。

一、“汉宋之争”的前奏：清初士人对明代科举的反思

元皇庆二年（1313）诏行科举，以程颐、胡安国、朱熹、蔡沈、张洽、陈澔等宋元经注作为钦定教材，其中《诗》《书》《易》“兼用古注疏”，《礼记》“用古注疏”。明洪武十七年（1384）定科举程式，《四书》义，主朱熹《集注》。经义，《诗》主朱熹《集传》，《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沈《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中期以后，颁《四书五经大全》，废古注疏。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氏《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① 清踵明轨，科举功令一仍明制，清廷出于治术需要，推重朱子学，科举考试基本牢笼于宋儒性理学之范围。自明代行八股之后，特重首场四书文，至于五经文及策问，为考官、士子所轻忽，其结果就是通经博古之士不易被选拔出来，进而“成荒经蔑古之风也”。② 顾炎武曾言：“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③ 徐乾学亦云：“士子虽试三场，实视首场书义为去取甲乙，其经义及格而已，至二、三场乃有数策点判之谚。此言非独主司，即士子亦自以为然，以故通经绩学者愈少。”④

自隋以后，科举程式对学术风尚影响甚大，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经史之学。顾炎武对唐以后的科举与经学发展之关系有过线条式的论述，认为唐代明经科一以官方修定的《五经正义》为主，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元明以后，朝廷欲统一学术，科举以宋元经注为准的，弃用“古注疏”，其结果就是通经之路愈狭，学问日益空疏。⑤ 他为此感叹：“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⑥ 对此，当时的博雅之士亦多有反思，且试图挽救。

康熙二十年（1681），朱彝尊受遣任江南乡试副考官，所出《康熙二十年江南乡试策问三首》是为典型。这三道策题脉络贯通，前后相承，核心议题是讨论当时科举钦定五经文教材问题，其意大致有三。首先，朱彝尊认为“圣人之学莫备乎经”，“儒生诵习经义，其首务也”；其“今五经取士，一本宋儒之传注，可谓醇矣”云云，是对当时清廷以宋元经注取士政策的肯定，属一般性的政治表态。其次，他认为汉唐注疏虽多杂谶纬，然当如欧阳修所论，删除驳杂即可，并以明洪武朝科举程式为据：“《春秋》不遗三传，《书》主蔡《传》而不遗《注疏》，《礼》则专主《注疏》，是汉唐诸儒之说仍多兼习。今《注疏》虽颁学官，而士之肄业者鲜矣。”⑦ 意在说明科举抡才当兼用“古注疏”。再者，即便是宋元经注，亦不能仅限于程、朱两家，学人士子当博采众说，探其本源，辨其优劣。与顾炎武以遗民自守不同，朱彝尊选择与清廷合作，使其能在科举实践中贯彻自己的主张。

早在康熙十一年，朱氏为孙承泽《五经翼》作序时就指出：“予惟经学之不明非一日矣。自汉迄唐，各以意说，散而无纪，其弊至于背畔，贵有以约之，此宋儒传注所为作也。今则士守绳尺，无事博稽，至问以笺疏，茫然自失，则贵有以广之。”⑧ 他批评时文牢笼于宋元经注之弊

---

① 周春健：《元代科考程式“兼用古注疏”考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周春健：《明初科举兴废与经学嬗变》，《孔学堂》2022 年第 1 期。

② 陈澧：《东塾集》卷 2《科场议三》，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 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81 页。

③ 顾炎武：《日知录（一）》卷 16“三场”条，严文儒、戴扬本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647 页。

④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 20《戊辰会试录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41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573 页。

⑤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 3《与友人论易书》，刘永翔校点，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黄珅等主编：《顾炎武全集》第 2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94 页。

⑥ 顾炎武：《日知录（二）》卷 18“四书五经大全”条，第 714 页。

⑦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 60《康熙二十年江南乡试策问三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18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324–325 页。

⑧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 34《五经翼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18 册，第 40 页。

说："帖括罔敢逸出，于是经书义稍有异于诸家者，多束而不观。"① 又据陆陇其《三鱼堂日记》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陆陇其过访朱彝尊，并客宿朱宅，二人论及宋元经注与"古注疏"之事，朱与陆言道"宋元诸儒经解，今无人表章，当日就湮没"，又言："程朱虽妙，然有日月，必有众星，有河海，必有细流，今诸儒一见与程朱异，便以为得罪先儒，如《诗》之《郑风》，亦不敢齿及古注疏，所以议论最难。"② 朱氏"不敢齿及"等语反映出宋明理学的一统局面对当时士子思想的禁锢，而"议论最难"可见此等通经博古之士对当时学风士风的无奈。

然而朱氏并未就此止言，特作《经书取士议》，进一步阐述自己的主张，其重点有二。首先，要纠正科场重四书轻五经的风气，应该先五经而后四书，使五经、四书并重；其次，明廷以《大全》取士，弃用"古注疏"，于科举程式不协，当别事修纂。③ 朱氏的观点在当时并非个例，与其同时的毛奇龄、方以智、阎若璩、潘耒、刘献廷等稽古博学之士皆有类似的看法，毛奇龄指出："向之合旧注、新疏、列代儒说见之帖经并诂义者，今止守宋人一家之言，是八比一出而经学尽废。"④ 方以智鉴于当时士子竞进，"童习章句，只知为制举义，博学故难"，⑤ 特作《士习论》一文，试图革除科举之弊，"庶学者尊经术，敦行义，人笃于自修焉"，⑥ 以为国家收尽忠尽责之士。阎若璩指出明代学问、文章远不逮汉唐宋元者有三，"一坏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取士，尽废注疏，其失也陋"。⑦ 潘耒也批评道："自科举之法行，士争趋于速化"，"保残守己，安于固陋，即见谓贯穿经史，出入百家，而其意止于捃摭藻采，增益辞锋，以供发策决科之用，采春华而遗秋实，有枝叶而无根柢，夫安得不谓之俗学乎"？⑧ 又言："近代取士，试之以帖括之文，局之以一家之说，既大异乎古，又先四书而后五经，人争致力乎其先者，而经学益衰……举子益视经为具文，而经学或几乎息矣。"⑨ 刘献廷在论及明永乐以后科举废弃"古注疏"造成的影响时指出："近日举子文，师心剿说，浮蔓无根，诚举明朝初制一申明之，使通今博古者得以自见，亦盛事也。"⑩ 刘氏"使通今博古者得以自见"之言，可谓是顾炎武等博雅之士省思当时科举程式的极佳注脚。

不仅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这类博通经史的学者对科举牢笼于宋元经注而造成学术衰败、人才凋敝不满，宋明理学内部的有识之士如黄宗羲、陈廷敬、陆陇其、汪绂亦有相似看法。

黄宗羲学承刘宗周，学术偏重于宋明理学，然对明代科举程式的批判较顾炎武、朱彝尊等人亦不遑多让。他有感于明季学术空疏之弊及人才凋零，指出"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⑪ 在论明末清初科举之弊时感喟道："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⑫ 他认为经史之学为人才的渊薮，而当时科举"所以破坏天下之人才，唯恐不力"。⑬ 在内容上，牢笼于宋元经注，片语不得掺入，限于一家之言，视古书为无用，他因此对晚明的周钟、

---

①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67《南泉寺新建惜字林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第399页。

② 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8，《续修四库全书》第559册，第561页。

③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60《经书取士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第318–319页。

④ 毛奇龄：《经问补》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1册，第237页。

⑤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卷3《四书大全辨序》，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9册，黄山书社，2019年，第360页。

⑥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卷3《士习论》，《方以智全书》第9册，第332页。

⑦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9"阎若璩论明学术之坏"条，李保民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5页。

⑧ 潘耒：《遂初堂集》卷6《格轩遗书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17册，第467页。

⑨ 潘耒：《遂初堂集》卷6《尚书讲义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17册，第468页。

⑩ 刘献廷：《刘继庄先生广阳杂记》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660页。

⑪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61页。

⑫ 黄宗羲：《破邪论·科举》，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8页。

⑬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碑志类《蒋万为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20册，第502页。

张溥、吴应箕、陈子龙、艾南英等人为救科举时文之弊，提倡复古、经世之风给予肯定；[①] 从录取程序上，考官去取只问头场，蔑弃其余，其结果便是士子不读书，造成人才凋敝，他为此疾呼：“以取士而锢士，未有甚于今日者也。”[②] 在《传是楼藏书记》《天一阁藏书记》《万充宗墓志铭》《易学象数论序》《朱康流先生墓志铭》《张待轩先生哀辞》《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对此反复申说，并提出挽救之法，与顾炎武等人可谓声气相通。

清初以朱子学著称的陆陇其亦指出：

> 永乐时纂《大全》，当时承宋儒理学大明之后，虽胡、杨、金、萧，未为升堂入室之儒，而所采取者，无非濂、洛、关、闽之微言。蔡、林诸儒又从而发明之，固皆有功学者之书也。然其缺略疏漏者，亦有矣。幸而朱子之全书具存，诸家之解释未尽湮没，溯而考之，以补《大全》之阙，不亦善乎？至于古注疏，则固汉唐千余年间学者之所讲求，程朱之学，亦从此出而益精焉耳。虽曰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然非郑康成、孔颖达之流阐发于前，程、朱亦岂能凿空创造耶？故程、朱之于古注疏，犹孔子之于老彭也。[③]

陆氏认为“汉宋之学，不可偏废”，[④]“至于诸经，皆学者所当用力，今人只专守一经，而于他经则视为没要紧，此学问所以日陋”。[⑤] 有感于士人多以科举为利禄之途，因此批判当时的科举习气，主张重视经史之学，呼吁为举业者当“无以利禄存于胸，惟知道之当求，而圣贤之不可不学，以居敬为本，以穷理为用，求之六经以探其奥，求之濂洛关闽以一其途，求之史以穷其变，求之敬轩、敬斋、月川、整庵诸君子之书以博其识，精择而笃行之”。[⑥] 陆氏为学虽一尊程朱，也不反对科举，但于科举陋习并不讳言，主张熔铸汉唐“古注疏”之学与程朱理学于一体。

与陆陇其大致同时的康熙朝名臣陈廷敬亦有相同的认识。陈氏学宗程朱，然而有感于科举时文之弊，专作《经学家法论》一文论其害。他开篇以朱子《学校贡举私议》重视注疏之学为据，指出当时学者“不惟诸家之说概不列于学宫，而举朱子所云专以为主之注疏，学者有终其身不知为何物者矣”。他认为科举时文“慢弃圣言，割裂传注”，“腐朽恶烂”，正如朱子所谓“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者也。盖经学之弊，原于时文”。最后疾呼：“欲正经学之失，须革时文之弊，时文之弊革，然后学者可以旁通诸家之说，以求得乎圣人精意之所存，而士不苦于无用之空言，国家收实学之效也。”[⑦] 汪绂是清初徽州地区著名的朱子学者，对徽州朱子学的复兴贡献颇巨，对当时科举牢笼于宋元经注也颇多不满，认为科举首场时艺不过是士子贾利梯荣之阶，既不关修身，亦不切实用，而可以考见士子学问根柢和裨益经世的二场、三场不过是具文而已，并不为考官和士子所重。他勉励学子跳出牢笼，从经史、诸子之学入手，以求得切己实用之学。[⑧] 此为当时理学内部有识之士的一种普遍省思和诉求。

综上，明永乐以后，科举仅用朝廷钦定的几部宋元经注为教材，在清初招致士人普遍省思，此中既有被视为乾嘉“汉学”先驱的通经博古之士，也有理学内部的有识之士。他们反思的焦点之一是明代永乐以后科举考试牢笼于宋儒经注及性理之学中，腐朽不堪，此种文化上的专制主义造成士子学问空疏，言行不一，人才凋敝。他们为此大声疾呼，试图革弊起新，将希望寄

---

①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序类《马虞卿制义序》，《黄宗羲全集》第 19 册，第 64–65 页。参见张循：《谁是清学开山祖？——从阎若璩论钱谦益看明清之际考证学的兴起》，《清史研究》2017 年第 4 期；马子木：《道艺之间：知识史视域下晚明清初时文研究的再思考》，《清史研究》2023 年第 4 期。

②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碑志类《蒋万为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 20 册，第 503 页。

③ 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 4《跋读书分年日程后》，《陆陇其集》，王群栗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77 页。

④ 陆陇其：《三鱼堂外集》卷 4《经学》，《陆陇其集》，第 321 页。

⑤ 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 6《与席生汉翼汉廷》，《陆陇其集》，第 129 页。

⑥ 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 9《钱孝端经义序》，《陆陇其集》，第 209 页。

⑦ 陈廷敬：《午亭文编》卷 32《经学家法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16 册，第 470–471、472 页。

⑧ 汪绂：《双池文集》卷 3《答方镏任书》，《续修四库全书》第 1425 册，第 67 页。

托于以“古注疏”为主的汉唐经史之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① 是明中后期兴起的考据崇实思潮的继续。随着程朱理学竭而无余华，考据学渐起，此种省思又为乾嘉汉学家所继承和利用，用以批判“宋学”，因而影响深远，可视为乾嘉以后愈演愈烈的“汉宋之争”的前奏。

二、清初御纂、钦定诸经“折衷汉宋”的宗旨

清廷入关以后，为了笼络人心，稳定社会，巩固统治，自顺治朝开始逐渐采取了“崇儒重道”的文教政策。从制度层面看，如科举取士、经筵讲学、博学鸿词、保举经学等；从文教层面来讲，如祭祀先圣先师、表彰程朱理学、刊布经史书籍等。同时，清初诸帝自谓治统、道统合一，常以“君师”自任，不仅倾心于儒家经典的学习，还注重对历代儒家典籍的整理、阐发与敷布。据学者研究统计，清代早期的顺、康、雍、乾四朝，前后命儒臣编纂“解义”“折中”“汇纂”“义疏”等经解书籍凡 19 种。清廷借助这一举措，彰显儒家经典的致治功能，昭示儒学道统与帝王治统的合一，强化伦理道德和尊卑秩序，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学术总结意味。②

御纂、钦定诸经在编刊之后，清廷相继颁令，以之作为各级学校育士、科举抡才的参考教材。康熙五十四年，《御纂周易折中》告成，康熙帝即命有司将之颁发中外，听其重刊，以广诵习。雍正八年（1730），清廷谕令颁发各直省《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各两部，一部用以重刊流布，一部以备校对。此后，乾隆元年（1736）、二年、三年、九年、十四年、二十九年、四十四年、五十年、六十年以及嘉庆九年（1804）、十四年，清廷多次颁发或赏赐各级学校御纂、钦定诸经，对其推广可谓尽心竭力。不惟如此，乾隆帝为政，处处效法乃祖康熙帝，极为重视学习和表彰儒家经史之学。乾隆元年御极之初，即命方苞等编纂《三礼义疏》，十五年付梓；遵康熙朝例，命有司将之颁发各直省，供士子学习；且任由坊间刊刻印刷，以广诵习。乾隆二十九年，《御纂周易述义》《御纂诗义折中》《御纂春秋直解》相继告竣，乾隆帝又令将此三书每省各颁一部，“依式锓版流传，俾直省士子咸资诵习”。③

康熙帝虽将朱子之学作为清廷的“意识形态”，然他“自弱龄留心经义，五十余年未尝少辍”，④ 于汉唐笺疏、宋儒义理均资讲贯，于是命儒臣相继编纂儒家经注，体现出鲜明的“折衷汉宋”的学术旨趣。《周易折中》所采诸儒之说，除宋元明儒者之外，采汉唐儒者经说计 35 家，⑤ 正如其所言：“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⑥ 其他诸经大体相同，《书经传说汇纂》除引宋元明儒者经说外，引秦汉至宋前儒者经说凡 50 家；⑦《诗经传说汇纂》采宋前儒者经说 56 家；⑧《春秋传说汇纂》采宋前儒者经说 29 家；⑨《仪礼义疏》引宋前儒者经说 95 家；⑩《礼记义疏》引宋前儒者经说 66 家；⑪《周官义疏》引宋前儒者经说 47 家。⑫

《春秋直解》《周易述义》体例较他书有所不同，不明引前儒之说，而是直阐经义，然《周

① 陈祖武：《论清初学术的历史地位》，《清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② 黄爱平：《清前期官修经解与官方经学探析》，《清史研究》2021 年第 5 期。
③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 12“颁发书籍”，《故宫珍本丛刊》第 334 册，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301–316 页。
④ 《御制周易折中序》，《御纂周易折中》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8 册，第 1 页。
⑤ 《御纂周易折中》卷首“引用姓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8 册，第 2–9 页。
⑥ 《御制周易折中序》，《御纂周易折中》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8 册，第 1 页。
⑦ 《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卷首“引用姓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 册，第 401–410 页。
⑧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卷首“引用姓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3 册，第 9–18 页。
⑨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首“引用姓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73 册，第 4–8 页。
⑩ 《钦定仪礼义疏》卷首“引用姓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6 册，第 4–10 页。
⑪ 《钦定礼记义疏》卷首“引用姓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4 册，第 5–13 页。
⑫ 《钦定周官义疏》卷首“引用姓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98 册，第 7–13 页。

易述义》亦“参合程、邵，酌中理数”，如乾隆帝所言：“皇祖《御纂周易折中》，广大精微，义无不备，综括汉唐以来诸说之全而取其粹，言《易》者无能出其范围。今是编也，异其体而宗其义，庶无忝乎祖述之旨云。”①《春秋直解》亦以《春秋传说汇纂》为宗，参合三传，融汇汉宋，“意在息诸说之纷歧以翼传，融诸传之同异以尊经”。②《诗义折中》“镕铸众说，演阐经义，体例与《周易述义》同，训释多参稽古义，大旨亦同”，“于汉以来诸儒之论，无不衡量得失，镜别异同”，“分章多准康成，征事率从《小序》，使孔门大义，上溯渊源”。③

对于御纂、钦定诸经兼综汉宋、折中众说的学术旨趣，乾隆帝说得较为明白：

> 朕又思圣祖仁皇帝四经之纂，实综自汉迄明二千余年群儒之说而折其中，视前明《大全》之编仅辑宋元讲解、未免肤杂者，相去悬殊。④

三礼馆总裁方苞亦不满《五经大全》“皆各主一人之说，且成于仓卒，不过取宋、元儒者一二家纂辑之书，稍摭众说以附之；数百年来，皆以为未尽经义，不称《大全》之名”，⑤故主张效仿康熙朝御纂诸经的体例宗旨。副总裁李绂曾建议“《三礼》以注疏为主，一切章段故实，非有大碍于理者，悉宜遵郑注、孔疏”；⑥而乾隆帝编纂《三礼义疏》则是“应取汉、唐、宋、元以来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⑦以阐明经学，嘉惠万世。

这一宗旨由《四库总目》中的评述亦可见一斑。《总目》受乾隆帝的个人意志影响甚深，对于康乾两朝御纂、钦定诸经的宗旨，馆臣自是心领神会，其评判亦不敢稍越雷池，也能较为忠实地反映出这批经书的学术旨趣。如评《诗经传说汇纂》云：“于众说之异同，既别白瑕瑜，独操衡鉴。而编校诸臣，亦克承训示，考证详明，一字一句，务深溯诗人之本旨。故虽以《集传》为纲，而古义之不可磨灭者，必一一附录以补阙遗。于学术持其至平，于经义乃协其至当。《风》《雅》运昌，千载一遇，岂前代官书任儒臣拘守门户者所可比拟万一乎！”⑧于其他经书，《总目》亦多以“折衷汉宋”“消融门户”等角度评价。

康雍乾三朝“颁发书籍”的系列举措对推动御纂、钦定诸经的流布作用匪浅，并对学校育士、科举抡才、学术流变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御纂、钦定诸经编刊之后，清廷开始下令禁毁坊间备科举之用的删节本教材。如清代科举《礼记》一经，以陈澔《礼记集说》作为指定教材。士子揣摩应试，于是坊间出现了大量删节本教材，如《礼记心典》《礼记体注》《礼记省度》等，但《三礼义疏》编定后，乾隆二十九年清廷下令：

> 《礼记》一书，未经朱子裁定，学宫所颁，仅有陈澔《集说》，其论议虽合乎儒先，而训释未能该洽。钦奉谕旨，考礼正文，特命儒臣纂辑《礼记义疏》与《周礼》《仪礼》，并垂黉序，洵足阐曲台之奥义矣。乃俗儒囿于方隅，惟揣应试命题，著有《心典》《体注》《省度》等书，坊刻流传，概从苟简，以便空疏不学之士，而全经竟束之高阁，殊于经学大有关系。嗣后专习《礼记》生童，务须诵读全书，不得仍以删本自欺滋误，其现在坊间所刻删本《礼记》，饬令地方官出示销毁，已经刷印者，禁止贩卖，毋许存留，贻误后学。⑨

详绎其言，明显是臣属为了迎合上意，以陈澔《集说》质量不佳，删节本贻误士子为由议禁，

---

① 《御纂周易述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8 册，第 568、565 页。
② 《御纂春秋直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74 册，第 3 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 16《钦定诗义折中》，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30−131 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 17，乾隆元年四月辛卯。
⑤ 方苞:《集外文》卷 2《拟定纂修三礼条例札子》,《方苞集》，刘季高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564 页。
⑥ 李绂:《穆堂别稿》卷 34《与同馆论纂修三礼事宜书》,《续修四库全书》第 1422 册，第 518 页。
⑦ 《清高宗实录》卷 21，乾隆元年六月己卯。
⑧ 《四库全书总目》卷 16《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第 130 页。
⑨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 14“书坊禁例”,《故宫珍本丛刊》第 334 册，第 326−327 页。

借此抬高《三礼义疏》。此举动摇了陈澔《集说》在科举中的独尊地位，如《总目》在评价《集说》时云："自明永乐中敕修《礼记大全》，始废郑《注》，改用陈澔《集说》，礼学遂荒"，[①]"用为蒙训则有余，求以经术则不足"，"是以国朝定制，亦姑仍旧贯，以便童蒙。然复钦定《礼记义疏》，博采汉唐遗文，以考证先王制作之旨，并退澔说于诸家之中，与《易》《诗》《书》三经异例。是则圣人御宇，经籍道昌，视明代《大全》，抱残守匮，执一乡塾课册以锢天下之耳目者，盛衰之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矣"。[②]馆臣的评价与清廷禁令可谓如出一辙。

其次，对科举抡才实践产生影响。康熙五十九年，李绂典试浙江，其《庚子浙江乡试策问四首》颇能说明问题。李氏认为"六经为载道之书，七十子之徒口相授受而已"，至汉代经学大盛，"始崇传注，各绳以一家之说，虽不必尽合圣心，而经学赖以不坠，不可废也"。魏晋以来，经籍散佚，至唐初，诏孔颖达等为义疏，学术定于一尊，凡前人解经之说，义疏所未采者，因亡不传；两宋诸儒出，经学大盛，南渡迄元，注解纷出，明初撰《五经四书大全》，而未被收录者之经说，渐次湮没。李氏因此得出"盖每有敕修，则一家之言易废，势使然也"的结论，而他的落脚点则在御纂诸经：

> 我国家崇重文学，加意六经，皇上御纂《周易折中》，次及《书》《诗》《春秋》，莫不亲加裁定。而前此好古之士，有《经解》之刻，宋元以来诸家略备。盖圣人折中于上，而众说备存于下，真千载一时之盛矣。[③]

在李绂看来，汉唐注疏、宋元经解以及御纂诸经皆能羽翼经传，士子读书应试当博采诸说，分别优劣，用以昌明经学。李绂的学术立场偏重于阳明心学，他勉励考生突破科举中宋元经说，强调："圣人之道，固备著于经，圣人之治，又备载于史，经以立体，史以致用，其理则一贯，其事则相须。"[④]这与他对当时科举之弊的体认有关，在《云南乡试墨卷序》《浙江庚子乡试墨卷序》中，他对考官重视四书义而轻忽经义之风予以严厉批判，主张取士应重经义，三场并观。[⑤]然康熙五十六年，李绂典试云南，其《云南乡试策问》又道出了另一玄机："我皇上圣明天纵，尊崇经学，御极以来，经筵日讲，寒暑不辍，五经《解义》既以刊行，近复御纂《周易折中》，《书》《诗》《春秋》以次亲定，士生斯世，宜无不留心经学者。"[⑥]联系到康熙五十四年《御纂周易折中》已经成书且颁发各直省，御纂《书》《诗》《春秋》诸经亦渐次编定，李绂的出题旨趣显然也是在迎合上意及清廷的文教政策。

上文指出，朱彝尊与陆陇其在私下讨论宋元经注及"古注疏"时，感叹"不敢齿及""议论最难"，感受到的是一股压力与无奈。其间既有元明以来科场强大的惯性因素，也与清廷的科举取士与文教政策密切相关。朱氏作为一个投效清廷的汉族士人，自是不敢对其公然非议，他的《经书取士议》也只是一家之言，并未上奏清廷，在当时也未产生实际效用；而作为衡文之官，他在策问中有"今五经取士，一本宋儒之传注，可谓醇矣"之语自属正常。而在御纂、钦定诸经编刊并成为士子应试的参考用书之后，其折中汉宋的学术宗旨，自然打破了科举教材"限以一先生之言"的藩篱，正如李绂论康熙御纂诸经所言"圣人折中于上，而众说备存于下"。其后乾嘉学者在典试、督学时，多以御纂、钦定诸经为引，提倡以"古注疏"为代表的经史之学。王鸣盛于乾隆二十四年典试福建，其策问题即引导士子在宋学之外，注重汉唐注疏之学，二者不可偏废："汉、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21《礼记正义》，第169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21《云庄礼记集说》，第170页。

③ 李绂：《穆堂初稿》卷44《庚子浙江乡试策问四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22册，第95页。

④ 李绂：《穆堂初稿》卷44《云南乡试策问五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22册，第91页。

⑤ 李绂：《穆堂初稿》卷34《云南乡试墨卷序》《浙江庚子乡试墨卷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1册，第610–612页。

⑥ 李绂：《穆堂初稿》卷44《云南乡试策问五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22册，第90页。李绂典试云南乡试时间，参见陈小辉：《李绂年谱》，《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唐、宋诸儒于经互有短长，不可偏废，要而言之，大约前则《十三经注疏》，后则朱子手定之书，此其最著者也。我朝文治诞敷，崇尚经术，御纂四经、钦定三礼，折衷至当，集古今之大成，而所采取亦惟注疏及朱子之说为多。"①乾嘉时，纪昀、洪亮吉、孙星衍等人奏请科举改用"古注疏"时，也屡以御纂、钦定诸经折中汉宋的宗旨为据。而乾嘉考据学家在科举抡才时，如何以经史古注出题，引导士子钻研古学，促进汉学的发展，学界已有深入研究，兹不赘述。②

最后，对学术流变产生重要影响。道光间，江藩著《汉学师承记》一书，为乾嘉汉学立统，在卷一前"引言"中，他开篇便点明"凡御纂群经，皆兼采汉宋先儒之说，参考异同，务求至当，远绍千载之薪传，为万世不刊之巨典也焉"。接着论述乾隆钦定诸经云："于《易》不涉虚渺之说与术数之学，观象则取互体以发明古义。于《诗》则依据毛、郑，溯孔门授受之渊源，事必有征，义必有本，臆说武断，概不取焉。于《礼》则以康成为宗，探孔、贾之精微，综群儒之同异，本天殽地，经国坊民，治法备矣。于《春秋》则采三家之精华，斥安国之迂谬，阐尼山之本意，洵为百王之大法也。"最后总结其"皆治经之津梁，论古之枢要，所谓悬诸日月，焕若丹青者也"。江藩在卷前不惮其烦地论述御纂、钦定诸经的编纂宗旨，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它们对乾嘉汉学的影响："于是鼓箧之士，负笈之徒，皆知崇尚实学，不务空言，游心六艺之囿，驰骛仁义之涂矣。"③

综言之，清前期的御纂、钦定诸经，有着鲜明的兼容汉宋、折中众说的学术旨趣，也是清廷文教政策的集中体现，④经清廷颁发各直省学校，成为士子功课、科举应试的参考教材，逐渐动摇了官方钦定的几部宋元经注在科举中的独尊地位，缓解了清初朱彝尊所感受到的"议论最难"的压力和无奈，解放了考官的思想，开阔了士子的眼界，使他们在平日功课、应举，乃至治学过程中认识到宋元经注与"古注疏"在文本内容、义理阐释等方面的异同和优劣，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与"古注疏"密切联系的经史之学，进而促进了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关于清代"汉宋之争"的形成原因，张循认为乾嘉汉学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宋学的挑战是经清廷默许，"是乾隆中期以后清朝官方的态度"，"《四库全书》编纂活动本身不啻是为汉学之士在思想上念了一道'松箍咒'"。⑤而由上文可知，给汉学家念"松箍咒"的不仅限于《四库全书》的编纂，而应当包括康雍乾三朝相继编纂的御纂、钦定诸经，其发端时间更早，且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四库全书》的编纂以及之后江、方二人的汉学、宋学之争是此问题的进一步凸显。

三、乾嘉汉学家对科举牢笼于宋元经注的批判

至乾隆中叶，经过清廷的提倡，顾炎武、朱彝尊等所倡导的经史考据之学逐渐取代清初盛行一时的程朱理学，成为学界的主流。在乾嘉考据学兴起之后，清学史上的"汉宋之争"应运而起，渐成燎原之势。乾嘉汉学家对宋学的批判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矛头就是宋儒蔑弃汉唐注疏，好逞私意，空谈义理，学问空疏，而科举抡才一以宋元经注为依归，则难辞其咎。他们将明代以来的科举与宋儒经注加诸一起进行批判，目的是宣扬以"古注疏"为基础的，"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经史考据之学。这既是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反思明代科举思潮的继续，也开启了愈演愈烈的"汉宋之争"。

钱大昕作为乾嘉经史巨擘，臧否人物较为"温柔敦厚"，然而对宋元经注及科举之弊，则予以毫不客气的批评。钱氏认为："夫六经定于至圣，舍经则无以为学；学道要于好古，蔑古则无以见

①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36《乾隆二十四年福建乡试策问》，《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394页。

② 冯建民：《清代科举与经学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③ 江藩著，钟哲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4–5页。

④ 黄爱平：《四库提要与清前期的官方经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⑤ 张循：《清代"汉宋之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兰州学刊》2016年第9期。

道。”[①] 其所谓“古”即指以“古注疏”为代表的汉唐经史之学。他批评元明以来的科举之弊道：“夫科目之设，聚数千万人之精神，而决中否于一二人之心目，虽长于鉴别，岂能无毫发之爽？……若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徒以揣摩剿袭为功，而侥幸以祈神之我佑，则非予之所知也。”[②] 又批评汲汲于帖括的宋学者道：“守残专己者，辄奉一先生之言以为依归，虽心知其不然，而必强为之辞。又有甚者，吐弃一切，自夸心得，笑训诂为俗儒，诃博闻为玩物，于是有不读书而号为治经者，并有不读经而号为讲学者。”[③] 他还对宋、元、明科举取士与学术风气之关系做了扼要分析，指出：

> 当宋盛时，谈经者墨守注疏，有记诵而无心得。有志之士若欧阳氏、二苏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经，蕲以矫学究专己守残之陋，而先生实倡之……元、明以来，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则又以能习注疏者为通儒矣。[④]

钱氏之言可谓深得学术流变中的“文质”递变之规律，也颇合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之义。他还进一步论科举与学风演变关系说：

> 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傅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名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为俗，即以为异，其弊至明季而极矣。国朝通儒，若顾亭林、陈见桃、阎百诗、惠天牧诸先生，始笃志古学，研覃经训，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⑤]

钱氏的反思和批评与清初诸老如出一辙，并将其落实在治学和科举抡才的实践之中。他在为友人褚寅亮所作的《仪礼管见序》中说：“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独《仪礼》为朴学，空谈义理者无从措辞，而朱晦庵、黄勉斋、杨信斋诸大儒又崇信之，故郑氏专门之学未为异义所汩。至元吴兴敖君善出，乃诋为疵多醇少。其所撰《集说》，虽云采先儒之言，其实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非有所依据也。然自敖氏之说兴，缀学者厌注疏之繁而乐其易晓，往往舍古训而从之。”[⑥] 钱氏耻蹈斯弊，乾隆二十七年主持湖南乡试时痛斥当时士子“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者，以致士子仿效成风，古学殆废”，力倡经史古学，使士子“咸知读书好古之足贵，而剿说雷同之无益，相与研覃经史，有本有原”。[⑦] 乾隆三十年主持浙江乡试，则批评科举时文“支离穿凿”“雷同剿袭”，而自己的衡文标准是“于经义，取其贯串注疏”。[⑧]

乾隆间藏书家、考据学者周广业在其《过夏杂录》中专列一条论“诸经古注疏”，也颇具代表性，他说：

> 元明以来，习科举者墨守宋元儒注，是以一家之言包括数圣人之微言大义，本属未尽。明中叶后，渐悟其非，于是有称述古注而疑宋人为杜撰者。本朝名儒硕学尤锐意于汉魏晋人之学，而宋学仅以供场屋之用而已。偶阅孙明复小集，中有《上范天章书》……广读此未竟，辄抚卷长叹，以为刘歆所谓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者，其明复乎！自此宋学兴而汉晋之书俱废，拘墟穿凿之说贻误学者不浅，罪归作俑，非明复而谁？然今之古注得存，犹赖宋刻，宋亦有君而无臣矣。[⑨]

周广业认为孙复建议宋代科举考试废弃“古注疏”，另作新注新疏，是宋儒说经穿凿附会的始作俑者，贻误后学不浅。

浙东学派的全祖望批评道：“近世之自署为朱学者，迂疏陈腐，但欲奉章句传注而墨守之，

---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4《经籍籑诂序》，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9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367页。
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 20《饶阳县新建文昌阁记》，《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 9 册，第 311 页。
③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 21《抱经楼记》，《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 9 册，第 329 页。
④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 26《重刻孙明复小集序》，《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 9 册，第 397 页。
⑤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 24《臧玉林经义杂识序》，《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 9 册，第 364 页。
⑥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 24《仪礼管见序》，《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 9 册，第 362−363 页。
⑦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 23《湖南乡试录序》，《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 9 册，第 345 页。
⑧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 23《浙江乡试录后序》，《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 9 册，第 346 页。
⑨ 周广业：《过夏杂录》卷 2“诸经古注疏”，《续修四库全书》第 1154 册，第 225−227 页。

不敢一字出于其外，以是为弗畔，锢其神明，塞其知觉，而朱学反自此而晦。”[①] 皖派戴震批评宋儒浅陋，不识郑学，“不足知其贯穿群经以立言；又苦《义疏》繁芜，于是竞相凿空……夫自制义选士已来，用宋儒之说，犹之奉新《经》而废《注疏》也”。[②] 纪昀认为：“国家功令，五经传注用宋学，而《十三经注疏》亦列学官。良以制艺主于明义理，固当以宋学为宗，而以汉学补苴其所遗，纠绳其太过耳。”[③] 凌廷堪认为宋儒经注导致天下士人“其于汉唐诸儒之说，视之若弁髦，弃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从之，较汉魏之尊传注、隋唐之信义疏，殆又甚焉”，认为是“此学术之又一变也”。[④] 卢文弨批评道：“至有宋诸儒出，始以其所得乎天之理，微会冥契，独辟窔奥，不循旧解。其精者固不可易，然名物、象数、声音、文字之学多略焉。近世学者安于记诵辞章之习，但知发策决科为务。与之言古训，骇然以为迂晦而难通，塞耳而不能听也。嗟乎！此学问之所以日入于靡烂，而有终身读书不识一字之诮也乎！”[⑤] 吴派江藩指出：“至于有宋一代，窃汉儒仁义礼智之绪余，创为道学性理之空谈，其去经旨弥远。明季专尚制义，囿于见闻，第乞灵于新安，几不知世有平叔，更无论矣。”[⑥] 又感叹道：“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元明之际，以制义取士，古学几绝，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⑦]

扬州学派阮元说：“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擘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⑧] 焦循自幼“学为科举文，习高头讲章，凡《存疑》《蒙引》等不下十数家，愈求之，愈不得其要。既见注、疏，遂舍去讲章旧说”，[⑨] 他认为宋学家谈义理，起于科第爵禄之计的八股时文，“惟知有讲章，讲章之所引据，则采摘于宋儒语录，故为是学者，舍宋人一二剩语，遂更无所主，不自知其量，犹沾沾焉假义理之说以自饰其浅陋，及引而置之义理之中，其芒然者如故也”。[⑩] 他鼓励士子“奋然自励，不以攻击为长，亦不以浮游相尚，进求乎圣贤立说之旨，以求会乎汉唐注疏之通”。[⑪]

此外，作为汉学“大本营”的《四库全书》，在其《总目》中评论汉学、宋学，乃至学术优劣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如何对待汉唐“古注疏”。馆臣批评宋学的原因之一是宋儒“摆落汉唐”，排斥汉唐经师旧说，空言义理，门户之见甚深，[⑫] 又批评宋明儒者道：“迨其末流，病古注疏之繁，而蔡《传》遂独立于学官。”[⑬] 在《毛诗正义》提要中，申说最为详明：

> 元延祐科举条制，《诗》虽兼用古注疏，其时门户已成，讲学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于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我国家经学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鼓箧之儒，皆骎骎乎研求古学。[⑭]

---

①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6《横溪南山书院记》，《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057页。
② 戴震：《戴震文集》卷11《郑学斋记》，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177页。
③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8《丙辰会试录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第337页。
④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23《与胡敬仲书》，王文锦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205页。
⑤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2《九经古义序》，王文锦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第25页。
⑥ 江藩著，漆永祥整理：《江藩集·隶经文》卷4《徐心仲论语疏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1–72页。
⑦ 江藩著，钟哲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第4页。
⑧ 阮元：《揅经室三集》卷2《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揅经室集》，邓经元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620页。
⑨ 焦循：《雕菰集》卷16《群经补疏自序》之“论语何氏集解”，《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广陵书社，2009年，第308页。引用时标点略有改动，“存疑蒙引”当指林希元《易经存疑》，蔡清《四书蒙引》《易经蒙引》。
⑩ 焦循：《雕菰集》卷15《王处士纂周易解序》，《焦循诗文集》，第276页。
⑪ 焦循：《雕菰集》卷15《代阮侍郎撰万氏经学五书序》，《焦循诗文集》，第273页。
⑫《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叙》，第1页。
⑬《四库全书总目》卷12《尚书句解》，第98页。
⑭《四库全书总目》卷15《毛诗正义》，第120页。

对于宋明经注，馆臣多以是否留意“古注疏”为评价标准之一，如批评明儒朱朝瑛《读周礼略记》“其注于汉唐旧说颇不留意”；① 又批评明儒彭勖《书传通释》沿《大全》之谬，偏主一家之说，荒弃古义，“所以欲尽废汉唐旧诂”。② 对于那些尊重古学的著作则给予较高评价，如评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能以注疏为根柢，尚变而不离其宗”，“能恪遵古本，亦为力遏横流。在经学荒芜之日，临深为高，亦可谓研心古义者矣”。③ 又评价钱澄之《田间诗学》能兼采注疏及宋儒经说，“持论颇为精核，而于名物、训诂、山川、地理言之尤详”。④

乾嘉考据学者对宋儒经说的批评不仅体现在治学宗旨与方法上，更将其落实于具体的治学实践中。在乾嘉诸儒中，程晋芳的学术立场稍偏宋学，但亦好经学，有《礼记集释》一书，他在自述撰作缘由时说：“自有宋贤诸著以来，注疏束高阁者且数百年，无论程朱片言只字，奉若圭璋，即蔡氏之《书传》、陈氏之《礼记集说》，亦以渊源有自，遂尔户诵家弦，至于今弗绝。夫蔡陈之作，其于古注疏，岂无救正厘剔处，然又何至惟知蔡、陈若齐人之知管晏耶？余之编《集释》也，于诸家同异遍列之，因以考证其得失。”⑤ 程氏对宋儒经说其实持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然对宋以后学者墨守宋元经说也深致不满，故称其书要“于制义而外，别存古人淹雅一门，使三代以上文物、声名可稽诸简册”，⑥ 与陈澔《集说》一较高低。吴派余萧客辑录《古经解钩沉》，主要以《十三经注疏》和李鼎祚《周易集解》为参考资料，他在“凡例”中批评宋元儒者经注云：“汉人、宋人说经殊旨鸿沟东西，大约在李唐限断……赵宋初叶，注疏尊为科律，渡江至元半，为诸儒集矢其间，所引复是注疏唾余，大率在不论不议之列。”⑦ 蜀籍学者李调元少习举子业，以陈澔《集说》为教材，“受而读之，以其间穿凿附会并及挂一漏万之处，颇不惬于心”，因此遍采历代诸家礼说，为《礼记补注》，欲“使陈氏无竹垞‘兔园’之讥，由蒙训而入经术”。⑧

与钱大昕一样，不少乾嘉学者亦将其反思落实于科举抡才实践中。如上揭，王鸣盛乾隆二十四年典试福建时，在策问中劝励士子注重汉唐古注疏之学；朱筠典试安徽时也引导士子：“诸生为文，必奉其说与经同，外是者谓之背经指，不入于令式也。然则诸生之为文，当法唐《正义》之所以疏经及传、笺、注、解者而后可，欲法之，则凡于经之天地、山水、宫室、器用、衣服、鸟兽、草木虫鱼之详悉，皆当周知，而先之以训诂，然后其于经之义秩然、粲然、怡然、涣然也。使者来江南岁试，且一周矣，其所以面与诸生谆谆言之者，通经与识字而已。”⑨

乾嘉汉学无论是古书的辑佚、辨伪、校勘，还是小学、典章制度的考释以及新注新疏，皆在于“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⑩ 正如章太炎弟子黄侃所言：“清儒经说虽精博，其根柢皆在注疏。故无清儒经说，无害也；无注疏，即群经皆不可读。”⑪ 然而乾嘉宋学家对汉学家的批评并非沉默不语，而是有所回应。乾隆初，学者马翮飞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曾云：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 23《读周礼略记》，第 184 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 13《书传通释》，第 108 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 19《周礼注疏删翼》，第 155 页。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 16《田间诗学》，第 131 页。

⑤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 2《礼记集释序》，《勉行堂诗文集》，魏世民校点，黄山书社，2012 年，第 720 页。

⑥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 2《礼记集释序》，《勉行堂诗文集》，第 720 页。

⑦ 余萧客：《古经解钩沉》卷 1 上《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94 册，第 357 页。

⑧ 李调元：《礼记补注》卷首《礼记补注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03 册，第 739 页。

⑨ 朱筠：《笥河文集》卷 5《安徽试卷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440 册，第 189 页。

⑩ 阮元：《揅经室三集》卷 2《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揅经室集》，第 621 页。

⑪ 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卷 1《汉学论下》，《章太炎全集》第 9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3 页。梁启超曾以“注疏”之学为中心，总括清代学术流变云：“自宋以后，程朱等亦遍注诸经，而汉唐注疏废。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74 页。

“近世一二名辈，因明代经生仅习宋人义训，于见闻稍隘，遂倡言宋儒空疏，乃思专宗汉儒，目为古义。好名之士，转相慕仿，遂至群然拾掇汉魏遗闻剩语，支离破碎、纷集杂陈，以相夸尚，以肆意讥诋宋儒，而不知六艺精深之旨有在也。”① 马氏极其不满汉学家崇汉攻宋的做法，而其“因明代经生仅习宋人义训，于见闻稍隘，遂倡言宋儒空疏”之言，正是从科举的角度道出了汉学以“古学”自矜，攻击宋学的缘由。程廷祚学问偏向于经史考据之学，亦因不满科举功令牢笼于宋儒之学中，引起与宋学关系匪浅的桐城派姚鼐的批评。嘉庆十五年，姚鼐从友人处得程氏遗集，阅后对其批评程朱之学极为不满，他指出：“盖其始厌恶科举之学，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于功令，未必果当于道。及其久，意见益偏，不复能深思孰玩于程、朱之言，而其辞遂流于蔽陷之过而不自知。”② 姚鼐的“厌弃科举”“束于功令”之言，正道出了程廷祚等批评宋学的深层原因。姚鼐为此屡与汉学家进行辩难，他一方面承认“当明时，经生惟闻宋儒之说，举汉、唐笺注屏弃不观，其病诚隘”，一方面又批评汉学家“近时乃好言汉学，以是为有异于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汉之俗学也，其贤也几何”，③ “是则今之为学者之陋，且有胜于往者为时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说，而失于隘者矣”。④ 姚鼐对汉学家的攻击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反映出科举中宋元经说与汉唐“古注疏”之间的紧张关系。

四、汉宋之争背景下乾嘉汉学家的科举改革呼声

乾嘉时期，由于清廷的提倡，一大批通经博古之士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进身高位。他们或以同年师友相互砥砺，或督学、典试一方，奖掖后进，表彰先贤，力倡经史之学，逐渐掌握学界话语权，使经史考据学遍及大江南北，蔚然成风。其中，试图变革科举程式，以“古注疏”突破宋元经说及性理之学，是他们力倡经史考据学的一项重要举措。乾隆五十七年，时任礼部尚书纪昀领衔上奏：

> 向来考试《春秋》，用胡安国《传》，胡《传》中有经无传者多，出题处甚少，且安国当宋南渡时，不附和议，借经立说，原与本义无当。圣祖仁皇帝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驳胡《传》者甚多。皇上御制文，亦多驳其说，科场试题不应仍复遵用，请嗣后《春秋》题，俱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穀梁》，即自下科乡试为始，一体遵行。⑤

纪昀的奏陈与《四库总目》所论一脉相承。《总目》论《春秋传》云：“顾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又云：“爰逮本朝，敦崇经术，《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于安国旧说，始多所驳正。弃瑕取瑜，撷其精粹，已足以综括原书。第其书行世已久，亦未可竟废。谨校而录之，以存一家之言。若其中纰漏之处，则《钦定汇纂》中业已抉摘无遗，昭示海内。”二者所论，大体无别。事实上，至编纂《四库全书》时，废除胡《传》之声已呼之欲出。

首先，胡安国南渡之后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其《春秋传》多借经以陈时政，尤重发明《春秋》的“攘夷”之义。而康熙、乾隆二帝出于政治需要，借编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及《御纂春秋直解》之机，极力消弥其“攘夷”之义，因此胡《传》中浓厚的“攘夷”色彩，成为

① 马翮飞：《答金新甫书》，《翊翊斋文钞》，《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11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② 姚鼐：《惜抱轩文集后集》卷1《程绵庄文集序》，《惜抱轩诗文集》，刘季高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8页。

③ 姚鼐：《惜抱轩文集》卷6《复孔㧑约论禘祭文》，《惜抱轩诗文集》，第92页。

④ 姚鼐：《惜抱轩文集》卷6《复蒋松如书》，《惜抱轩诗文集》，第96页。

⑤《清高宗实录》卷1419，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壬午。

清廷的稳固统治的障碍，此为清廷废除胡《传》的政治原因。① 其次，胡《传》受北宋孙复、刘敞“废传解经”风气的影响，因此在学理上遭到了清廷和学界的批评。康熙帝批评其“率多穿凿附会，去经义逾远”，② 乾隆帝评其“义理穿凿，则非义理之真”，“终不足以服学者之心”，③ 虽与三《传》并行，然其“傅会臆断，往往不免”。④ 而在乾嘉汉学家看来，三《传》去古未远，更得圣人之本意，钱大昕《左氏传古注辑存序》就指出：“汉之经师，其训诂皆有家法，以其去圣人未远。魏、晋而降，儒生好异求新，注解日多，而经益晦。”⑤ 因此，清代三《传》之学大兴，前中期以左氏学为甚，注重对其史实的辨析、文字的训诂、地理沿革的考察，变宋元以来“臆解”为“征实”之风；嘉道以降，西京之学盛，《公》《穀》书法义例之学渐兴。在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因素下，胡《传》遭清廷所弃在所难免。馆臣指出明代科举仅用胡《传》，“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而士子无视秦汉经传，“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⑥ 而清廷沿用不废的原因仅仅在于士子“久诵胡《传》，难以骤更”。⑦

纪昀的奏陈适逢其时，既有学理依据，又策略性地搬出康熙朝《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和乾隆帝为《春秋直解》所作之序作为依据，因此其议为清廷所采纳。其所谓“《左传》本事”即《左传》传文，此次改革虽未参用汉唐“古注疏”，但以《左传》经文出题，使考生摆脱了胡《传》的束缚，直面秦汉经传本身，朱彝尊在《经书取士议》中指出的“习《春秋》者，置左氏《传》不观，问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之弊病，⑧ 至此得到一定的救治。段玉裁为此欢呼：“迨宋儒尽舍三《传》说《春秋》，前明竟以胡安国注列学官取士，我高宗纯皇帝乃黜胡《传》，用《左传》，以《公》《穀》辅之，真万世不可易之制。”⑨ 阮元亦评价纪昀此举“尤为有功经学”。⑩ 艾尔曼认为，“纪氏之奏请获准，象征汉学在朝廷获胜”。⑪

乾隆五十八年贵州岁试，学政洪亮吉为避免士子揣摩应试，一改旧辙，“于寻常拟题外出题”，而士子答题茫然不得其解。洪氏认为推本其故，在于元儒陈澔《集说》本为科举而作，“遇可备出题者，注解略为详明，其余即谫陋殊甚，是以士子无所遵循”，他为此上《请礼记改用郑康成注折子》：

> 伏查《十三经正义》现列学宫，内《礼记》及《仪礼》《周礼》皆用汉儒郑康成注，最为详备。诚如我皇上钦定《礼记义疏》所云：“精奥无如郑注者也。”且陈澔《集说》，其详明者，皆采取郑注；其简略者，即自以意为删改，是用郑注则《集说》之精华已备，用《集说》则昔贤之训诂半沦。近奉到部咨，《春秋》一经，奏定改用三《传》，凡士子有志读书者，无不欢欣踊跃，争自濯磨。臣愚昧之见，可否《礼记》改用郑《注》？俾诸生通晓全经，兼明五礼，似于读书行已皆有裨益。⑫

洪亮吉治学宗尚汉学，奏请岁试《礼记》改用郑《注》，是效仿纪昀做法，当与其学术立场相

---

① 罗军凤：《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40–50 页；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377、440–444 页；秦行国：《胡安国〈春秋传〉在清代的遭际》，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 年，第 59–118 页。

② 《御制春秋传说汇纂序》，《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73 册，第 1 页。

③ 《御制日讲春秋解义序》，《日讲春秋解义》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72 册，第 2 页。

④ 《御纂春秋直解序》，《御纂春秋直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74 册，第 3 页。

⑤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 24《左氏传古注辑存序》，《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 9 册，第 361 页。

⑥ 《四库全书总目》卷 27《春秋传》，第 219 页。

⑦ 《四库全书总目》卷 29《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第 235 页。

⑧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 60《经书取士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18 册，第 318 页。

⑨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 4《驳山东巡抚请以邱姓人充先贤左邱明后博士议代礼部》，赵航、薛正兴整理：《经韵楼集附补编两考》，凤凰出版社，2010 年，第 74 页。

⑩ 阮元：《揅经室三集》卷 5《纪文达公集序》，《揅经室集》，第 678 页。

⑪ 艾尔曼：《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 年第 4 期。

⑫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 9《请礼记改用郑康成注折子》，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 年，第 190 页。

关，是乾嘉汉学家改革科举程式的又一次努力，然其奏请经礼部覆议遭到驳斥。从礼部批驳郑《注》“祖尚谶纬”“引据无实”“牵强穿凿”及“陈澔《集说》，于郑《注》菁华，采择大备，且简明便于章句，是以列在学官数百余年”等语，[①] 可以推知此驳议当是采纳了宋学一派官员的意见，是宋学家对汉学家进攻的回应。因为汉学家对郑玄之尊崇可谓无以复加，即便对郑玄经说有所订补，但对郑学断断不会如此诋讥，而乾嘉诸儒及四库馆臣对陈澔《集说》却多有轻蔑之辞。接下来驳议中“《钦定礼记义疏》，郑康成《注》，陈澔《集说》，兼收并列，原以汉宋诸家，义各有当，惟择其是者而从之，未尝稍示轩轾，诚圣人之折衷，集礼经之大成也”云云，[②] 再次印证了前文所言清廷御纂、钦定诸经“折衷汉宋”的旨趣，同时反映出它对此后的学界确已产生重要影响。汉学家利用它来突破宋儒经注的牢笼，而宋学家也可以之回应汉学家的攻击。否决洪亮吉动议的理由，最后落脚在“设科取士，五经所用传说，颁行日久，多士师守旧学，见异弗迁”，则可见元明以来科举程式强大的惯性，已成为乾嘉汉学家改革科举程式的巨大阻力。

然而乾嘉汉学家的努力并没就此终止。嘉庆年间，孙星衍上《拟科场试士请兼用注疏折》，[③] 奏请科举改用“注疏”。孙氏认为“科场风气关系人才升降，但使人人争读《注疏》，则士尽通经，通经则通达朝章国典，经义遂为有用之学”，而当时“士风孤陋，止读《四子书》、宋儒章句，不窥汉唐经义”，而考官“因陋就简，或有空疏者，至屏斥古人经训，批抹成言，博学之士无由进身，黉舍教士之书，亦成虚设”，他为此提出补救之法：

> 汉儒学有师法，所注诸经，率本七十子微言大义，唐儒《正义》亦集魏晋以来诸儒经学之大成。伏读御纂、钦定诸经，先用郑康成及魏晋诸儒注语，次引孔颖达疏义，兼采宋儒，折衷睿鉴，列圣稽古同文之治炳若日星……且经义取士，创自宋、元，元皇庆二年，诏考试程式，《诗》以朱氏，《尚书》蔡氏，《周易》程氏，及《春秋》《礼记》皆兼用古注疏。至前明初，《书》主蔡氏，犹及古注疏，《礼记》主古注疏，其后渐以废弛。当时虽矜尚气节，议礼多成聚讼，积习相沿，急宜振作。[④]

从孙氏的奏陈可知：首先，清初顾炎武等人批判的科举之风具有强大的惯性，至乾嘉之时在科场中并没有多大的改观，即便乾隆帝将《十三经注疏》颁发学校供士子学习，多年之后仍然如此。其次，孙氏对康雍乾三朝御纂、钦定诸经编纂宗旨的认识，再次证明皇帝的这一做法从“意识形态”方面解放了学者思想，孙氏才能引之为自己的说法张目。最后，孙氏主张虽未被清廷所采纳，其“定令不许屏斥其兼用古注者”也未被清廷定为科场条例，但乾嘉汉学家在典试、科举抡才时，多以“宗古注”来选拔通经博古之士的做法，长期以来也是为清廷所默许的。如乾隆五十一年朱珪典试江南，阅卷时非常重视“首场三艺皆宗古注”者；[⑤] 此外亦有不少考据学者因制义用“古注”为考官所赏拔。[⑥]

总之，乾嘉汉学家对科举程式改革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个中原因，除了宋学家的回击、

---

①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21“考试题目”，《故宫珍本丛刊》第334册，第393–394页。

②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21“考试题目”，《故宫珍本丛刊》第334册，第394页。

③ 据孙氏《平津馆文稿·自序》可知，《平津馆文稿》大致作于嘉庆七年至十一年之间；另外，《平津馆文稿》卷上有《增设郑氏博士议》，此《议》乃是孙氏仿嘉庆七年四月清廷增设伏氏博士所奏，紧接《拟科场试士请兼用注疏折》，据此，孙星衍此《折》当作于嘉庆七年前后。参见孙星衍：《平津馆文稿》卷上，《孙渊如先生全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77册，第512–514页；马振君：《〈孙渊如先生全集〉成书考略》，《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1期。

④ 孙星衍：《平津馆文稿》卷上《拟科场试士请兼用注疏折》，《孙渊如先生全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77册，第512页。

⑤ 朱锡经编：《南厓府君年谱》卷中，北图社古籍影印编辑室辑：《乾嘉名儒年谱》第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522页。

⑥ 如孙志祖通古学，乡试策问答题用李鼎祚《周易集解》，对答最详，为主考庄存与所赏识。会试时，主考官裘曰修以“黍稷与与”为题，孙氏“以黍稷分比数典不紊”，中会试第六名。阮元：《揅经室二集》卷5《孙颐谷侍御史传》，《揅经室集》，第497页。

科场程式惯性以外，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乾隆朝的文教举措，如博学鸿词、经学保举、殿试科举策论、编刊经史书籍等，虽促进了经史之学的传衍，但乾隆帝对科举抡才的改革却相当审慎。其原因有大致二：

首先，乾隆中后期，乾隆帝虽极力表彰经史之学，然而科举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惯性较强，牵一发而动全身，关涉士子平日的功课、各级学校的课业、各层考试程式，贸然改革，恐难施行。如乾隆二十三年，御史杨方立奏请乡会试加增《周礼》《仪礼》二经命题取士，即遭乾隆帝否决。理由是：其一，三礼互为表里，其义蕴萃于《礼记》，便于士子临场发挥；其二，科举用《礼记》，相沿已久，另增二经不过是叠床架屋而已。可见，科场习气，相沿已久，让乾隆帝对科举教材的改革有所顾忌，因而相当谨慎。①

其次，乾隆帝早期偏重朱子学，中后期喜好经史之学，② 然而在涉及国家“意识形态”的文教改革时，却又相当审慎，采取的是一种“折衷汉宋”的调和态度。乾隆五年，乾隆帝命科道诸臣进呈经史讲义时指出：“今之说经者，间或援引汉唐笺疏之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固不可废，而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朕愿诸臣研精宋儒之书，以上溯六经之阃奥，涵泳从容，优游渐渍，知为灼知，得为实得，明体达用，以为启沃之资，治心修身，以端教化之本。”③ 乾隆八年，监察御史陈仁奏请以经学注疏、全史原委考察翰詹诸臣学术、经济之才，亦遭到乾隆帝否定，他回驳道：“如必试以经学注疏、全史原委，更恐难其人矣。且即有其人，亦遂能保其文行相孚，坐言而起行乎？”④ 乾隆五十九年，蒋衡仿汉熹平故事，书十三经经文并刻石，乾隆帝亲自制序，指出历代的经典注疏冗繁不堪，且流于“入主出奴”的门户之见，学者果能潜心勤奋经学，当潜玩经文，“以经解经”，从而探得圣人之道。⑤ 因此，乾隆一朝的科举程式，在四书五经文场次先后上虽多有调整，但在教材上，除《春秋》一经之外，并无较大变动，仍以宋元经注为主。

五、结语

综上，自清初至乾嘉存在一股若隐若现、贯穿始终的“潜流”，即关于科举“兼用古注疏”或改用“古注疏”的论争，既关涉清初至乾嘉学术演进的内外因素，亦与乾嘉及其后的“汉宋之争”息息相关。

其一，科举作为隋以后的主要抡才制度，对人才的选拔、学风的形成影响匪浅。清廷在继承明代八股取士制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因袭其弊端，因此顾炎武、朱彝尊等通经博古之士以及理学内部的黄宗羲、陆陇其等有识之士，基于对明代科举专用宋元经注的省思，提倡“兼用古注疏”以矫其弊，其实是一种“借古言今”。此为清学史上“汉宋之争”的前奏，在当时并未引起清廷的注意，却为后来乾嘉汉学家所继承和利用，用以批判“宋学”，鼓吹以“古注疏”为代表的汉唐经史之学。其后《四库总目》以及江、方等人的汉学、宋学之争是这股“潜流”的进一步彰显。由此可见学术史上的显性问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一个由隐至显的渐变过程。就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对重新审视清代“汉宋之争”的起源具有参考意义。

其二，学术流变纷扰复杂，既有学术演进的内在因素制约，也受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在清初至乾嘉科举“兼用古注疏”这股关涉“汉宋之争”的“潜流”上体现鲜明。以钱

---

① 《清高宗实录》卷 557，乾隆二十三年二月甲申。

② 夏长朴：《四库全书总目发微》，第 437–491 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 128，乾隆五年十月己酉。

④ 《清高宗实录》卷 194，乾隆八年六月壬子。

⑤ 《清高宗实录》卷 1463，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庚午。

大昕等为代表的乾嘉汉学家试图通过改革科举程式来进一步倡导汉学，一定程度上源自清廷御纂、钦定诸经“折衷汉宋”的宗旨。清廷此举在学术上虽多为人诟病，但这些经书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代表，在成为书院教学、科举应试的教材后，对考官、士子的思想有所解放，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不再牢笼于科举考场中的宋元经说，逐渐将目光转移至以汉唐“古注疏”为代表的经史之学，此可视为清初至乾嘉学术演进的一种外部因素。另一方面，清初顾炎武、朱彝尊、黄宗羲、陆陇其等人不约而同地对明永乐以来科举进行反思，认识到宋元经注在文本或义理层面的不足，主张“兼用古注疏”以芟其弊，是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实学之风在清初科举领域的集中反映，体现出一种回归汉唐、崇实黜虚的治学理念。此风后为乾嘉考据学者所继承和发扬，是为清初至乾嘉学术演进的内在因素。汉学家和宋学家围绕科举“兼用古注疏”的交锋，亦成为后来愈演愈烈的“汉宋之争”之先声。

References

Elman, Benjamin A. “Qingdai kejü yu jingxue de guanx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Qing Dynasty). *Gugong bowuyuan yuankan* (Palace Museum Journal) 4 (1996).

Feng Jianmin. *Qingdai kejü yu jingxue guanxi yanjiu*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Qing Dynasty). Wuhan: Huazh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0.

Huang Aiping. “Qing qianqi guanxiu jingjie yu guanfang jingxue tanxi” (Early Qing Dynasty interpretations of Confucian works and official Confucian classics).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5 (2021).

Ma Zimu. “Daoyi zhijian: zhishishi shiyu xia Wanming Qingchu shiwen yanjiu de zai sikao” (Between principles and arts: Rethinking the contemporary prose during Ming-Qing tran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4 (2023).

Xia Changpu. *Siku quanshu zongmu fawei*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Siku Quansh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20.

Zhang Xun. “Qingdai ‘Han-Song zhizheng’ yanjiu de huigu yu zhanwang” (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studies on the ‘Han-Song Controversy’ in the Qing Dynasty). *Lanzhou xuekan* (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9 (2016).

The “Hidden Current” of the “Han-Song Debate”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Use of “Ancient Commentarie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YANG Qinghua (School of Philosophy, Anhui University; 995510586@qq.com)

Abstra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scholars like Gu Yanwu and Huang Zongxi reflected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the Ming period, which mainly used Song-Yuan commentaries. They advocated the use of “ancient commentaries”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they saw. This was the origin of the “Han-Song Debate” in Qing thought. During the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reigns, the imperial textbooks combined both Han and Song commentaries, which broadened scholars' views and allowed them to move away from the sole reliance on Song-Yuan commentaries, focusing instead on “ancient commentaries” in their studies. Later, scholars of the Qian-Jia period criticized the use of Song-Yuan commentaries in exams and promoted the “ancient commentaries” from the Han and Tang periods. Figures like Ji Yun, Hong Liangji, and Sun Xingyan also tried to reform the examination system to use these ancient commentaries,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fueling the “Han-Song Debate” in Q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Key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ancient commentaries, Song-Yuan commentaries, Qian-Jia scholarship, Han-Song debate